章士钊与李大钊的特殊情谊

▲章士钊(左)与李大钊(右)

章士钊(1881-1973),曾任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这两位迥然不同的两个人之间,却有着特殊的一段交往经历,彼此影响很深。

出生于长沙的章士钊,21岁时考取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并成为该校的学生领袖。一年后,章士钊担任进步刊物《苏报》主笔,24岁时去了日本,成为孙中山、黄兴的策士。1914年,章士钊在东京创刊《甲寅》杂志。《甲寅》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大的政论刊物,是《新民丛报》之后、《新青年》之前影响最大的杂志。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南陈北李",都与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有着密切联系。陈独秀的"独秀"之名,就是首先在这一刊物上出现的。而李大钊则是因参加《甲寅》杂志,结识了章士钊,成为挚友,突破北洋法政原来的狭小圈子,广泛地接受革命党人的影响,使自己逐渐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

1913年冬,李大钊东渡日本,1914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李大钊早在国内时,就十分爱读章士钊主办的《独立周报》,并担任过该报在天津的发行员。李大钊还与同学发起《言治》月刊,发表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与《独立周报》遥相呼应,其中有的文章甚至直接引述章士钊的观点。

当李大钊到日本看到《甲寅》杂志即将出版的广告后,非常高兴,马上写了一篇题为《风俗》的文章,并以自己的字守常为名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章士钊读后,"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章士钊语)

章士钊按照信上附的地址写信约李大钊见面。章士钊亲切地问李大钊:"你向《甲寅》投稿,为什么不署本名而用号?"李大钊微笑着回答:"先生名钊,我何敢名钊!"简单的一句话,体现了李大钊的谦虚、机敏、幽默,也表现了李大钊对章士钊的尊重。

1917年,章士钊和李大钊都回到中国,章士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并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当时称主任)。在李大钊进入北大之前,1917年1月,章士钊在《甲寅》杂志停刊一年多后,在北京又创办了《甲寅》日刊。章士钊邀请李大钊和高一涵担任日刊主笔。由于与章士钊的友情,李大钊放弃了正在筹备的杂志,全身心地投入到《甲寅》日刊的编辑与写作之中。李大钊在该刊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涉及面相当广泛。

这个时候,李大钊已经从事马列主义的传播,搞革命活动。为了方便李大钊的工作,章士钊向校方推荐,自动地把馆长一职让给李大钊。

1918年1月起,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这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阶段,他不仅为北大图书馆的改革作出了贡献,而且为北大师生的学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服务。80年过后,美国图书馆学会所编纂的《世界图书馆和情报工作大全》,就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章士钊把李大钊带入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为李大钊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在这里,他开启了北大图书馆现代化的进程,成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

(摘自《党史博采》)

老校记(十九)

带偏瘫妻子跑车,不足3平方米的驾驶室全是深情

当爱人身患重病,你能否对她不离不弃?有一位货车司机用实际行动,给出了满分答案。

曾经,货车司机聂师傅带着偏瘫妻子跑车的视频引发全网关注。这对来自甘肃陇南的夫妻,结婚已经20年。妻子曹盈盈因为脑出血导致偏瘫,生活不能自理。丈夫聂建文就把她带在身边,一边拉货赚钱,一边悉心照顾。

在不到3平方米的驾驶室里,聂建文给妻子烧菜喂饭,为她梳洗打扮,让她保持干净清爽。他还每天背着妻子下车活动,带着她做康复训练。

她一病,家里的天塌了一半

聂建文和曹盈盈是初中同学,第一次相遇,聂建文就对这个开朗漂亮的女同学动了心,"一眼就看中她了,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聂建文家境贫寒、长相普通,但曹盈盈偏偏就认准了他。从校服到婚纱,两人携手走过青葱岁月,于2003年结了婚。

为谋生计,婚后第4年,聂建文从甘肃跑到上海做货车司机。曹盈盈则留在老家,她一边照顾两个儿子和婆婆,一边还开了服装、饰品、鞋子3家店,把一家人的生活料理得井井有条。

眼看两个孩子越来越大,为了能多挣点钱,夫妻俩一合计,买下一辆二手货车,开始自己跑运输。单干的第一年,聂建文就挣了十多万元,这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可就在这时,厄运突然降临到这个家庭。

2020年5月的一个晚上,曹盈盈突然晕倒在路边,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在ICU待了十多天。因为脑出血,曹盈盈做了开颅手术。术后的她,右侧身体从头到脚都失去知觉,上厕所需要人抱,吃饭需要人喂,也不能讲话。

聂建文当时在外地送货,等他回到家,妻子已经脱离危险。看到妻子,他没忍住哭了出来,"原来那么能干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倒下了……"

曹盈盈住院花了近20万元,掏空家底还欠下近6万元外债,3个小店关了门,这个小家已无力支撑康复疗养的费用。思来想去,聂建文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妻子带在身边,边跑车赚钱,边照顾妻子。揣着仅剩的2000元钱,聂建文带着妻子出发了。

车开到哪里,家就在哪里

跑车,相当于把家安在流动的车上。货车的驾驶室不足3平方米,两个驾驶座的后面是一张宽0.6米的卧铺,这就是聂建文和妻子的生活空间。两人的洗漱用品、锅具调料、衣服被褥,则被塞在各个角落。

每天清晨,聂建文照顾妻子洗漱和吃饭后,就开始一天的车程,曹盈盈则躺在后座的卧铺上,看着他开车。有时,聂建文要连续开车十多个小时,直到卸货完毕,他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才能靠在座位上休息一下,睁开眼又继续赶路。

曹盈盈刚开始大小便失禁,经常拉在褥子上,聂建文每次都会默默收拾好,没有一句怨言。到了休息区,他就打来水给妻子洗头、洗脚,擦洗身体。知道妻子爱美,喜欢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他准备了很多亮色衣服,还搭配了耳环、墨镜,隔一两天就给妻子换一身。

担心妻子长时间躺着不舒服,聂建文想趁着休息时间带她下车活动一下。但是,狭小的驾驶室里转个身都费劲,要把一个偏瘫病人弄下车来,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用床单把自己和妻子绑在一起,再背着妻子踩着轮胎、踏板,一步步挪下驾驶室。试了几次后,聂建文已经可以熟练地背着妻子上下车,带她做些简单的康复训练。

除了照顾妻子的起居生活,聂建文还格外关注她的情绪变化。刚生病时,曹盈盈接受不了自己偏瘫的事实,一度情绪消沉,聂建文就变着花样哄她开心。路上做饭不方便,但妻子爱吃美食,尤其喜好辣口、咸口,聂建文就在车上备了咸菜、辣椒酱,给她配面条吃。不跑车的间隙,他就让妻子点喜欢的外卖,"随她点,只要她高兴就好。"

即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聂建文也努力给妻子营造美好的瞬间。

后来,夫妻俩在货车上的生活被儿子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收到很多网友点赞,大家纷纷称赞聂建文为"男人的榜样"。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聂建文还清了卡车的贷款和妻子看病的外债,肩上的担子总算轻了些。"接下来想多赚点儿钱,再换一个大点儿的车头,这样我妻子就能住得更舒服。"

聂建文与妻子住在上海郊区的一间平房里,有单子就一起外出跑车,空闲时就去周边逛逛,给她买漂亮衣服。他还注册了一个视频账号,用来记录陪伴妻子治病的点点滴滴。两人有爱的生活瞬间吸引了90多万网友关注,他们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卡车夫妻"。遗憾的是,2024年1月,曹盈盈因旧疾复发不幸离世。

而他们的故事,真正体现了那句:无论贫穷富有、健康疾病,我都爱你、陪伴你,直到永远……(摘自《知音》2024.8 奥可白/文)

村上春树为什么一直未获诺奖

诺贝尔文学奖评起来据说相当微妙复杂,但原始评审标准则只有寥寥15个字:"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100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大体授予了维护人的尊严与自由、张扬人的价值和美好的作品,"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究"——包括2012年获奖的莫言在内,可以说是获奖作家的共同追求。

我来试着对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以下简称村上)一二十年来始终未能获奖的原因做一个猜想。说来有趣,即使当年,较之中国本土的莫言,也有不算很少的人更关心村上能否获奖。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我当然更关心,并为此接受了包括日本主流媒体如共同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在内的许多媒体多次预测性采访。每次我都预测村上获奖的可能性在60%至75%之间。非我趁机自吹,我不但翻译村上——据说全世界数我译得多——而且研究村上,总不至于胡乱预测或瞎猜一气,而是有相关的学术性根据。

那么为什么村上始终没能获得一般认为最具普世性的诺贝尔文学奖呢?关于这点,其实任何解答都纯属猜测,那么也让我猜测一下。我猜有可能因为英译本没能充分译出村上文体独特的艺术性。说简单些,英译本译得不好。例如村上小说英译本的主要译者和研究者、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杰·鲁宾曾深有感触地说道:村上小说"完全无法做到所谓的'逐字直译'。因为外来语使用片假名拼写,有些材料在日文里便具有撩人的外国语调和长相,但当译'回'英文、混杂在其他英文字之间时,它们便全然丧失了这些特质。"

20世纪90年代村上在普林斯顿大学作为访问讲师为美国研究生上课期间,一次他将翻译成英文的日本当代作家吉行淳之介的一篇短篇小说同日语原文两相对照,发现英文"完全奈何不得汉字酿造的字面'情韵'。不仅如此,来自文体微妙特性的不可思议的'滞涩感'也已消失。"

总之,村上文体(风格)的"最重要特质"在译"回"英文时流失了。而少不了汉字的日文本身的文体情韵又未必得到充分传达。这意味着,村上小说的文体艺术在英译本中大大打了折扣。这样,注重文体的艺术性和创新性的诺奖评委怎么可能把诺奖这顶桂冠戴在村上头上呢?而中译本哪怕译出一朵花来——纯属假定——也在诺奖评审中派不上用场。而且,唯一懂中文的评委马悦然去世5年了。(据文学自由谈微信公众号 林少华/文)

中国近代最早的儿童期刊

《小孩月报》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儿童期刊,但历史上中文同名的《小孩月报》存在三种版本:榕版、沪版和穗版。它们是何种关系呢?

据考辨,穗版《小孩月报》由传教士嘉·约翰1874年2月于广州创办,停刊于1874年10月。后由传教士范·约翰于1875年5月在上海接续出版,出版语言为中文,英文名同为"The Child's Paper",1881年5月更名为《月报》,1915年再度更名为《开风报》。由此,穗版与沪版《小孩月报》属承继关系,实为一家。

而榕版则是自成一体。榕版《小孩月报》,英文名为"The Children's News",1874年2月创刊于福州,创办人为福州美以美会传教士李承恩夫妇和胡巴尔夫人,因1879年李承恩夫人去世,后由许高志夫人、娲标礼与娲西利两姐妹、唐女士相继主撰。因此,从时间上看,说榕版《小孩月报》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儿童期刊,并不为过。

榕版《小孩月报》原件现已失传,只留存一期的封面。从当年基督教年会记录之《美以美会福州年会录》等相关资料看,"这是每月出版的散页出版物,其中包括圣经故事、短篇小说、童话和箴言等,插有石印图画等"。名称虽有"报"字眼,但《小孩月报》的新闻性与时效性不强,实为儿童期刊。

沪版《小孩月报》的主要版块有天文易知、教会近闻、游历笔记、寓言故事、忏悔类文章等,主要传播教义与西方科学知识,文中运用大量手绘与插画。

榕版《小孩月报》是中国首次采用地方方言的儿童杂志,利用拉丁字母书写福州方言。"本报《小孩月报》特用榕腔刻成,缘教中会友不识文理者多,若诸传道阅读是报,则易于识悟也。""盖男妇老小不难于数阅月内便能习读之。"由此看出,榕版《小孩月报》的读者群不仅仅是未成年的小孩,还包括广大的未接受知识教育的福州底层民众。较之于沪版《小孩月报》的办刊宗旨,榕版《小孩月报》除了传教与童蒙,还多了一个:扫盲。

榕版《小孩月报》终刊于何时,并无据可查。据1904年《美以美年会录》,最后一次查到月报的相关信息:"榕腔《小孩月报》每月仅售五百本,与旧年同。"由此看来,榕版《小孩月刊》自1874年创刊以来,历经30年,因社会动荡与销售问题而极有可能停刊了。

(摘自《福建日报》 赖泽栋/文)

"乱七八糟"源于两次战乱

"乱七八糟"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成语,虽说家喻户晓,但耳熟却未必能详。

其实,"乱七八糟"源自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两次战乱。"乱七",指的是发生在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刘氏政权,分封了一大批刘氏子弟为王。这些刘氏封王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到汉景帝刘启时,分封的诸侯势力已发展到足以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程度。其中齐、楚、吴三个封国的势力几乎占到汉朝天下的三分之一。汉景帝深感政权不稳,便采纳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实行"削藩",即削减刘姓诸侯王的领地规模和特权范围。大权在握的刘姓封王自然不会同意,于是,吴王刘濞串通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6位诸侯王联合起兵发动武装叛乱。汉景帝最终平定了这场全国性的叛乱。此次叛乱共有7位刘姓王参与,史称"七国之乱"。

"八糟",指的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朝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八王之乱"。太熙元年(290),晋武帝驾崩,国内诸王看朝廷昏聩,于是发动内战,争夺中央政权。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晋书》称之为"八王之乱"。于是,后人便将这两次历史上著名的叛乱联系起来,造出了一个新的成语:"乱七八糟"。

(摘自《内蒙古日报》)

徐悲鸿改『画作』价格

1921年,57岁的齐白石开始大胆突破传统画风,赋予中国画以新的活力。但是,他的这一做法遭到了画坛保守派们的一致反对和攻击。他们极力贬低齐白石,认为他的画是"野狐之禅",俗不可耐。

齐白石的画因此备受冷落,甚至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但是,他也只能在这样的一片否定声中,苦苦支撑着。

几年后,在一个国画展览会上,齐白石的一幅《虾趣》被挂在一个很不显眼的角落里,且标价仅为8元,为全场最低价。这让齐白石无比失落。

展览会第二天,会场来了画坛上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他便是时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徐悲鸿一眼便看到齐白石的那幅画,立即让画展负责人将其移到展厅中央,与自己的《奔马图》挂在一起。

接下来,徐悲鸿还亲自提笔将《虾趣》的标价从8元改为80元,并在一旁注上"徐悲鸿标价"5个字。《虾趣》因此一跃成为全场标价最高的画,比徐悲鸿《奔马图》的标价还要高10元。

徐悲鸿的这一举动,一下子引起了轰动,也让处于低谷的齐白石再度声名鹊起,重新得到认可。受到鼓舞的齐白石因此坚定了创新之路,最终成为画坛泰斗级大师。

徐悲鸿"自降"作品价格,提携处于逆境中的画友的品质,令人佩服,可谓德艺双馨。

(摘自《思维与智慧》 夏生荷/文)